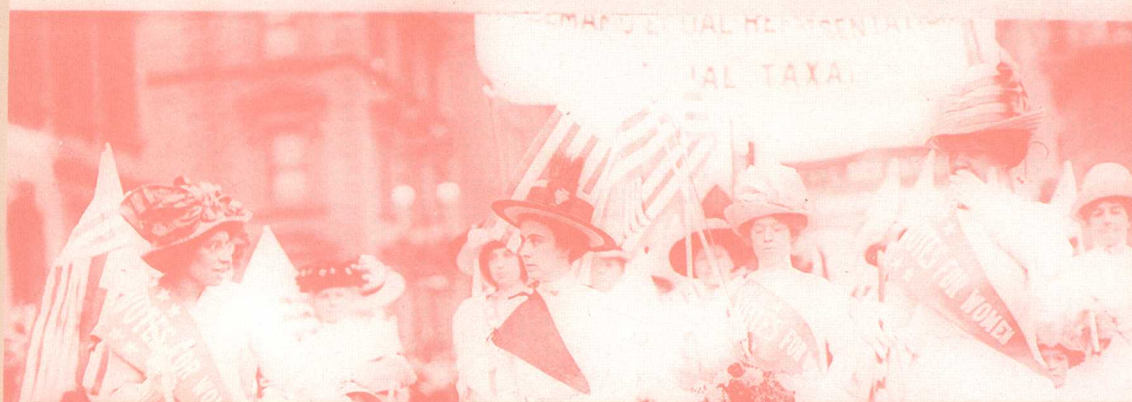


非常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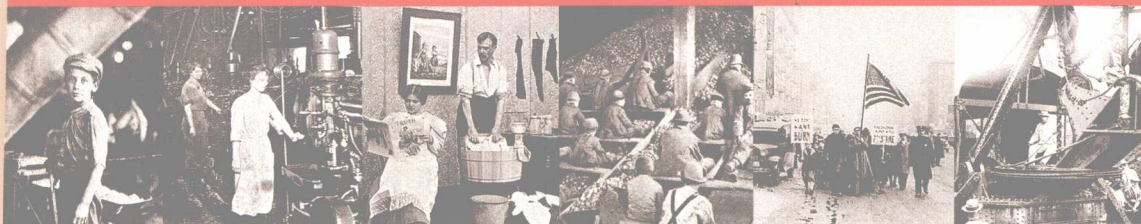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美] 史蒂文·J. 迪纳 著 萧易 译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史蒂文·J. 迪纳 著

萧易 译

非常时代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时代: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 (美) 迪纳
(Diner, S.J.) 著; 萧易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ISBN 978-7-208-07938-0

I. 非… II. ①戴…②萧… III. ①美国—近代史—1890~
1917②美国—现代史—1917~1920 IV.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8087 号

责任编辑 蔡欣
装帧设计 丁威静



非常时代: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美] 史蒂文·迪纳 著

萧易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4,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38-0/K·1457
定 价 35.00 元

致 谢

当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和阿瑟·王(Arthur Wang)邀请我撰写这本书时,我最初的念头(没跟他们提起过)是:“我们真的需要另一部关于进步时代的书籍吗?”也许,每个时代都需要撰写自己的历史,可是,最近已出版了几部一流的叙述,且还不说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然而,我仔细掂量了一下这件事,突然意识到,还没有人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它讲述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纷繁的美国人的故事,虽然在过去大约25年里,历史学家们已经撰述了浩繁的专业著作,它们是这段历史可以依据的基础。五年后,我对他们激励我来写这本书心怀感谢。埃里克·福纳曾为这项计划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了无价的建议。阿瑟·王一向源源不断地给予鼓励,以他那种独特的方式亲切地敦促我加快速度完成书稿,他还是一位驾轻就熟的编辑,为倒数第二稿出了力。我对他们两位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希尔暨王(Hill and Wang)出版公司的劳伦·奥斯本(Lauren Osborne),他熟练并满怀热情地担负了书稿的最后编辑和出版工作。

对于那些阅读手稿并提出详细意见的同事们,我所欠甚多,他们包括: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林恩·戈登(Lynn Gordon)、吉姆·吉尔伯

特(Jim Gilbert)和斯蒂芬·怀特菲尔德(Stephen Whitfield)。罗伊·罗森茨威格还对我计划之初写下的初步大纲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我希望我对他们那些无价的建议已经妥为采用了。1995年夏天,在乔治·梅森大学,我把这份手稿的一个雏形分发给了“进步时代”课程上的研究生。我感谢他们每个人,因为他们给教师的著作提供了率直的评价,而这位教师是行将决定他们终考成绩的。而且,我特别要感谢那些花费时间为我写下书面建议的学生,他们包括:贝齐·伯斯坦(Betsy Burstein)、玛丽·德林杰(Mary Dellinger)、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马克·莱韦斯克(Marc Levesque)、尤娜·马哈(Una Mahar)和休·莫特克斯(Sue Moutoux)。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办公室的全体职员打出了各样草稿的修订本,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向以下诸位致谢:雷切尔·吉西(Rachel Giesey)、乔·里特(Jo Ritter)、埃娜·莫里亚蒂(Erina Moriarty),尤其是贝齐·罗(Betsy Rowe),她设法让职员们不必为我的手稿操劳,仿佛它是她最优先考虑的工作。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的主管查伦·赫特(Charlene Hurt)给予我特别待遇,允许我借出多得多的书籍,借期也要长得多。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从头到尾愉快地核对了引文和书目资料。

1994到1995学年的学术休假期间,我完成了大半的研究和写作,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员学术休假计划和乔治·梅森大学“克拉斯诺前沿研究会”的支持使之成为可能。我要向克拉斯诺学会委员会的主席马克·弗里德兰德(Mark Friedlander)致以特殊的谢意,感谢他给予的大力支持。我自己系里的教授玛丽昂·德谢姆克(Marion Deshmukh)和杰克·森瑟(Jack Censer)提供了秘书性质的支援,还有复印资金和热情的个人鼓励。

早在近30年前,我就开始对进步时代的社会史产生兴趣,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已故的阿瑟·曼(Arthur Mann)。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他那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教导学生该怎样思考和撰写历史的精湛能力,还有他的贤明指导。

我作为学者所成就的一切,最大程度上始终该归功于哈茜娅·迪纳

(Hasia Diner)。她独自一人自始至终阅读了诸多的草稿,跟我讨论了这个计划的每一阶段,挨过了太多有关进步时代的晚餐对话。对于她那些有批判力的见识和意见、她无情的校订、她不断的鼓励,还有她的爱,我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已经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时代。我们已经遭遇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以传统的方式从事商业——我们不再以人们过去一贯的方式去经营制造、销售、运输或通讯中的任何一项。今天，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个体已经被淹没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既不是为自己工作，也不是作为传统工作习惯中的合作人去工作，而是作为雇员或多或少地为大公司工作。曾几何时，公司在我们的商业事务中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如今他们成了主角，大多数人都成了公司的仆人……

昨天，乃至自有历史以来，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个体存在；今天，人们的日常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机构发生的，而不是跟其他个人。

这下子，完全是一个新的社会时代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新时期，一个生活戏剧的新舞台。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912年

目 录

引 言		001
开场白	1890 年代的危机	011
第一章	业主、经理和公司资本主义	026
第二章	产业工人争取控制权	044
第三章	工业美国中的移民	069
第四章	美国农民和工业资本主义	094
第五章	美国黑人对自由的追求	116
第六章	公司化美国的白领工作者	145
第七章	专门职业的控制权之争	164
第八章	美国政治中的进步论述	187
第九章	世界大战和争取控制权的竞争	217
文献说明		247
译名对照表		276

引言

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一边摧毁了传统的机遇,一边又展示了令人激动的新前景。他们颂扬开拓的成就和史无前例的丰裕,然而又悲叹自己丧失了独立、自主,甚至自由。进步时期的美国人目睹大公司用开发的新技术生产出空前的财富,提供成百万的新职位,出售数量惊人的生活消费品,还开放了以前意想不到的人生选择。他们目睹变革的威力横扫熟谙的经济生活模式,更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重整习以为常的社会等级,还重新定义了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规则似乎都变了。日渐身处一个由大型机构组成的互助社会里,为了控制自己的生活,个体美国人作了许多选择,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现代美国的复杂面貌就是从那些选择和竞争、那些新机构、那些成功和失败者、那些有力和无力的行动中呈现出来的。

一位英国人记录了他 1900 年的美国之行,宣称“美国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电话、电报、电唱机、电铃、汽车、电梯和自动器具”。^[1]到了 1910 年,美国人

[1] 引自 John Whiteclay Chambers II, *The Tyranny of Change*, 2nd ed., New York, 1992, p. 2。

能购买电动缝纫机、电扇、电熨斗、洗衣机、吸尘器、电炉、电热器、留声机和其他一大堆设施。电报几乎是在即时传输讯息，电话的使用在世纪之交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1910年，近100万个家庭和办公事务所开通了电话。改良的铁路使人们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旅行；有轨电车和高架铁路允许人们往返于偏远的住所和市区的工作、购物、娱乐之间。新世纪初，电影放映机掀起了大众娱乐的革命。1900年，美国人拥有大约8000辆汽车；到了1920年，数目已增至800万辆！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空前高度，从1880年代中期的110亿增长到了一战末期的840亿定值美元*。

诸如美国钢铁(U. S. Steel)或万国收割机(International Harvester)这样的巨型公司创造了大多数新货物和服务，大权在握，它们是一些不具人格的实体，由远程的经理们领导着，后者仿佛是隐身的。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享受到了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物质利益，却担心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无法控制。私营企业家的经济重要性有所衰减，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公司工作。个体的保障日益仰赖公司的行为和少数资深主管的决策，他们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似乎是较为不重要的。公司资本主义并没有公平地分配它的物质利益。早在1890年，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就拥有了51%全国不动产和动产，而最贫困的44%只得到1.2%。

乡村和城市都爆发了阶级冲突。工人们成立了工会，开展罢工，雇主使用暴力击败他们，工人们则以牙还牙。农民们面临一个难以预测的农产品国际市场，农业价格、铁路运费和信贷成本则是由强大却看不见的资本家决定的。他们组织了农民联盟，在1890年代前期创立了人民党(Populist Party)，以期终结富人们对全国劳动者的统治，然而以失败告终。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比例持续下降。全体农民中，雇农和分成制佃户从1880年代的26%上升到1910年代的37%。此外，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里，农民

* Constant dollars, 定值美元, 经过换算, 包含了通货差异, 用来衡量不同时期美元值的美元估价。——中译者

总的来说正在缩减成一个少数群体。1890年,所有美国人中有35%住在城市里;到了1920年,住在城市里的人增至51%。

数量空前的移民蜂拥而至,在膨胀中的工业经济体系内工作,他们多数由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构成,来自南欧和东欧的那些陌生国度。这些人通常住在稠密的市区,那儿以外语为主,他们修建了自己的教堂、犹太会堂和公共机构。少数人带来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很多老派美国人担心他们的文化会被外国人控制,这也不足为奇。

工业主义和城市文化也威胁着规范男性和女性的准则。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在中产阶级男女地位上有着严格的限制,规定男性负有公共事务的责任,而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然而,随着工业主义的发展,这种分离弱化了。妇女承担了公共新角色,她们要求获得投票权,在高中和大学里就学,和男人一起在办公室里工作。年轻男女流连于舞厅、游乐园和电影院。这方面的准则也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

189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美国人开始指望政府会出面干涉美国经济、文化中这些让人不堪的变革。他们眼看着腐败的政治魁首主宰着城市和许多州政府,以微不足道的恩惠迎合移民和工人阶级的选民,同时依靠来自电气公交公司、铁路、公用事业和承包人的贿赂养肥了自己。他们目睹那些托拉斯操纵着众议院议员,利用法院和联邦势力镇压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异议。看来,依照美国理念本该代表民众意愿的政府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很多中产阶级美国人因而得出结论,他们不但已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还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只要控制了创造财富所需的土地、工具、知识和其他资源,这个人就是富有的,这种理念在殖民时期和19世纪早期的美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这个土地一向充裕的新兴农业国家里,赚取工资的劳动曾让人蒙羞,因为他有求于人。女人的劳动依法属于她们的丈夫或父亲,她们被认为从性别上来说天生就是仰赖于他人的。1820年代后的市场变革使得工资劳动力开始稳步增长,并不分男女,这迫使人们对独立的含义作出重新评估。新型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持,只要人们能够自由出卖劳力,他们

就还是独立的。反对南部各州奴隶制的北方人谴责说，“这一乖僻的制度”剥夺了美国黑人从自己劳动中获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批评者觉得工业雇佣就是“拿工资的奴隶制”，认为完全仰赖雇主的工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一向是自由美国人的特征。同时，独身女性参与工资劳动的人数日益增加，向宣扬女性依附性的传统理念发出了挑战。

美国内战之后，随着小企业主、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加速衰退，大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资本和劳力之间的继起斗争加剧了对工资奴隶制的担忧，这些忧虑在基础广泛的改革运动中达到顶峰，后者通常被称为进步主义，该类运动从1890年代起开始改造地方政府，到了世纪之交，就着眼于州政府和全国政府了。本杰明·帕克·德韦特(Benjamin Parke De Witt)是一个对当时政治充满热情的学者，他在自己发表于1915年的论文《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中对此作了精练的概括。“给工业巨头和铁路大王带来财富的复杂情形，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措的社会和经济难题……个人不能指望跟雇用他的公司较量，”德韦特解释说，“人变成了经济奴隶……慢慢地，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并不自由。”^[2]

许多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赞成德韦特的信念，即进步改革是对公司资本主义出格行为的一种反击，它主导了1890年代至一战之间的美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社会的统治机构，包括公司、政府、改革组织、政党以及领导它们的人。很多记述考察了这些成就，探究了进步改革者和政府官员的动机，这些人通过扩大政府的领域和职能来抑制大企业，缓解工业化对人的影响。

不过，另有历史学家认为，公司资本主义是动力，包括政治和改革在内的其他一切都是它的后果。由于其无可比拟的规模和复杂性，集团公司需要操控影响生产和利润的一切因素：原材料供给、劳动力、产品需求、他们能

[2] Benjamin Parke De Witt,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New York, 1915, p. 14.

索要的价格以及政府的行为。大公司的需求主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

还有一些人认为,公司资本主义的壮大只是以工业化为土壤的那种经济和社会革命的一方面,它把美国从一些孤立的地方社区转变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现代官僚社会。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组织革命(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不但衍生了公司资本家,还衍生了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改革者,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知识让政府有了影响社会力量的可能,如果不说是控制的话。因而,想要操控市场的公司资本家们,由于掌握了专门技术而宣称自己在社会里职能不凡的内科医生或科学家们,还有试图掌控变革势力的进步改革者们,他们都助长了一个现代组织社会的官僚价值。

这些着重于公司、政府和改革运动的记述强调了一个变革中的美国的关键方面,不过它们描绘的图画是不完整的。最近几十年里,社会历史学家们探究了人们在这个美国社会的变革期里的行为举止。大量文献纪实地描述了工人、移民、农民、黑人、妇女、家庭、儿童和其他群体的经历。这些专项的社会史录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不过,因为很大程度上这些记录描述的美国人群体是彼此孤立的,也孤立于政治和机构变革,所以显得支离破碎。

我的叙述试图把政治的、机构的和社会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它主要讲述的是变革中的人的故事,只不过放在政治、公司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的背景下讲述它们。面对工业化、公司资本主义、进步改革和一个由大型机构组成的复杂社会,不同情境下的美国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那些针对变革的各式反应构成了我讲述的故事的实质。

我主要是围绕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人们来构思我的论述的:那些依靠类似方式谋生的人、男人和女人、移民、黑人,还有其他有着共同祖先的人。我把具有相同性别、祖先或职业的人称为“群体”(groups),尽管有着相同祖先或职业的人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此外,群体相互重叠着。一位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地区的纺织工人可能是男性,同时也是一个移民、天主教徒、意大利裔美国人和产业技工。所有的这些群体都该属于社会史的考虑范畴,

不过这些类别并不相互排斥。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定义像男性、女性、移民或农民这样的群体，不过，根据人们看待自己以及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我还定义了另外的群体。比如说，在办公室或百货公司工作的男女们，他们为自己是“白领”雇员而感到骄傲，虽然他们通常赚的钱比熟练技师要少；还有内科医生、律师、社会工作者、教师和图书管理员等，他们都为自己的“专业人士”身份而自豪，尽管他们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社会史要求我们讨论群体，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群体的成员资格始终是变动的，群体的分界向来是可渗透的，而且群体内部的差异可能跟群体之间的差异一样显著。

接下来的篇章考察了在美国的变革中，美国人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府管理的方式。不同的群体需要什么？他们想从那个新兴的社会里获得什么？他们是怎样贯彻自己的目标？他们成功或失败的程度。少数人在信件、日记、自传、访谈之类的东西里留下了对他们人生目标和经历的直白叙述，不过，通过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工作、家庭、社区、闲暇时间和政治方面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对他们的目标作出很多猜测。大部分人追逐生活中的三个目标：他们试图获得经济保障，即在物质享受方面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准；他们要求个人自主权，即作出人生选择、开创事业、建立家庭和维持社区的能力，不受来自他人的不适当干涉；他们还追求社会地位，即来自同侪或整个社会的尊重和承认。

人们面临全然不同的抉择。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富人跟穷人、白人跟黑人或印第安人、欧洲移民跟亚洲移民之间也是一样，前者拥有更多的选择。不同群体以及群体里的不同个人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追逐他们的目标，对这些角度的重要性也各有看法。穷苦的普通劳工或南方的分成制佃农操心更多的是经济保障而不是社会地位。那些经济较有保障的人，比如熟练技师，则强烈抵制工厂在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变更，它们不仅仅蚕食了他们的收入，还侵害了他们按照自己步调工作的能力和他们的自主权，他们想方设法地保持传统上给予一位手工匠的尊重和社会地位。通过

担任教师或办公室职员这类“受尊重的”职位,缺钱的中产阶级女性得以维持她们的社会身份。

一个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往往跟另一个群体的相互冲突。当制度发生变化时,人们不断较量着(有时还是以激烈的方式),想要获得利益或维持现状。最起伏跌宕和持久的冲突让公司负责人和工人成为对立面,前者要求控制生产,后者需要经济保障和工作场所的自主权。19世纪晚期的农民,无论是身处大平原还是南方,都同样与铁路经理、银行家、制造商以及其他公司资本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涉及的问题包括运输费用、信贷,还有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时他们所获的价格。

制度和政治变革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这些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抗争,不过,人们也通过非正式的和无组织的方式追求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譬如,产业工人和农民往往宁可各处迁徙,也不愿接受苛刻的条件、长期的贫困或衰减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欧洲和别的地区的农民、工匠来到美国,黑人离开南方乡村来到南方城市或北方,分成制佃农更换地主,中西部农民的孩子到更西的地方去购买土地。工人频繁跳槽,导致那些新型流水线和机械化纺织厂不断更替人手。工厂工人、家庭佣人、拿工资的农业工人、非技术劳工以及其他一些人放慢工作的步调,让那些努力想要加快生产速度的工头和科学管理者心灰意冷。通过这些无组织的行动,产业工人、分成制佃农、家庭佣人等等挑战了公司经理、地主和女主人的权势。

非正式的较量和公开冲突还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城市里的工人阶层乐于在酒吧间放松身心,他们为了获取休闲时间的自主权,和中产阶级的禁酒拥护者们产生对抗。工人阶层还抵制了市政领导试图限制他们尽情使用公园和公共场所的努力。当他们的经济保障有赖于孩子的收入时,他们公然违抗童工法和义务教育法,这些法令是在改革者的努力下颁布的。

性别角色的变化有时让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由于雇主支付女性较低的工资,对男性的经济保障造成了威胁,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身份感,某些产业的男性工人努力想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尤其是在一战劳动力

紧缺的时期。为了地位着想,许多男性内科医生和律师也同样试图排斥女从业者。

寻求经济保障、地位和自主权的竞争既发生在群体之间,也发生在群体内部。某些专业工程师试图避免公司雇主的干涉,从而赢得自主权,其他人则通过完全认同公司经理来争取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大公司的工头们努力维护在车间里按照自己的意愿监督工人的职权和自主权,不让它受到新型人事经理和效率工程师*的侵犯。相互竞争的移民领袖在自己的社区内为了获得权力和社会地位而较量。一战中,集体迁离南方运动的黑人组织者挑战了南方黑人社区中那些牧师、商人和其他获得承认的领袖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在许多情形下,当他们遭遇变革的无情威力时,美国人试图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里,对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寻求往往引发与别人的竞争(如果不说是冲突的话)。

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个群体的联盟往往团结起来,力图实现共同的目标。在组织女装业工会的成功运动中,犹太人、意大利移民工人和犹太商业及专业领袖、女性进步改革者,外加富裕的俱乐部女会员团结在了一起。被多数改革者鄙夷的城市政治集团(political machine)联合了许多不同民族的移民和本土生工人,在某些地区甚至和改革者一起制定劳工和社会福利法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把一批黑人领袖和某些进步改革的主导者联系在一起。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情形下,群体们围绕着特定的议题汇聚在一起。

此外,截至20世纪早期,美国政治论述主要在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在这个公司资本主义的时代里,背景多样的美国人努力试图对美国民主的含义作出新解释,他们追问政府怎样能够保护百姓避免工业主义和经济集中带来的副作用,以及这个政体怎样能够通过政府重新把握国家的命运。诚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参与了这场占主导地位的讨论,而且那些参与讨

* Time and motion engineer,效率工程师,专门研究工业操作效率的人士。——中译者

论者往往各执己见。不过,在美国进入一战之前的15年内,许多美国人把他们的关注点从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转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即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工业国家的未来。

当然,身处其他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也跟变革较量着,也努力试图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并不想说,只有在进步时期的美国,人们才为了获取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而奋斗。然而,普通美国人对自主权的追求提供了一个窗口,尤其适合于观察从1890年到一战末的美国,因为在这些年里,公司资本主义和一个复杂社会的呈现迫使数百万人为了把握自己的生活而适应改变,同时,乐观的改革者们宣称,政府其实能够控制变革的势力,使美国人的生活高效、美好和自由。

我把这个时代称做“进步主义时期”(Progressive Era),虽然这个名词至多不过表述了那个时代的改革运动和政纲,但是历史学家照例使用这个术语,而且较之其他术语,读者最容易认可它。这个时代从1890年开始,当时,社会服务社(settlement house)社员和地方平民组织发起了各式各样的改革运动,而截止于一战以及它的直接后果,因为那场战争加速了变革,大大削弱了各种不同群体的行动和目标。不过,我并不打算暗示,改革在这些年里主宰了一切活动,或发生在这段时期的一切事件(包括所有在改革旗帜下做的事)都是积极变革的组成部分。从1890年到一战的那些年里,公司经理们暴虐地镇压罢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对黑人的私刑飙升,同时,南方白人在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剥夺选举权方面取得了成功。从任何现代定义上来说,该时期的这些还有其他许多方面都谈不上“进步”。

我不打算拿进步时期的经验应用于今天。不过,我得承认,那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时代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令我感到吃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工业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改变一切规则之际,所有的美国人都试图控制他们个人的生活,一些人还试图控制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力量。20世纪末,身处全球信息时代经济引发的令人痛苦的新转变之中,似乎美国人又一次在力求获得控制权。与他们一个世纪以前的先辈们不同,当今的美国人玩世